

有感而发——《大江东去——沈祖安人物论集》（第三卷）序

黄源

《大江东去——沈祖安人物论集》（第三卷）序，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1 年

沈祖安同志现在也早过了古稀之年。因为他从事文艺工作时间较早，对艺术方面涉猎更早，所以在浙江文化界早已成为众望所归的老前辈。因为他处事待人，非常热心，也非常诚恳，无论老少，都是“公平交易，老少无欺。”

我调到浙江来主持文化工作，他还是小青年，还没有成家立业，也还没有名望，但是他做事认真。当时他是浙江文联创作组的成员，主要从事戏剧、曲艺方面的写作。后来在出版社工作，负责戏曲、曲艺方面的编辑工作，省文化局分管的副局长王子辉带他来见我。

我们第一次接触，就是打算出版三本书。①第一本书就是越剧演员姚水娟的艺术经验。因为姚水娟不但是当时浙江越剧界的头一块牌子，影响很大，同时也是越剧女子的笃班中比较突出的一位，当时的“三花”、“一娟”，这“一娟”就是姚水娟，后来才有了筱丹桂和袁

雪芬等许多名家陆续出来。祖安同志提出出版她艺术经验的计划，我就在王子辉同志的条子上批了两个字：“可以”。②

当时我曾提出：姚水娟的艺术经验，以后要不断记录整理下来，把她最拿手的几本戏当中的表演经验整理出来。后来在遂安路浙江省文化局开了个碰头会，专门把姚水娟请来。省文化局副局长王子辉和出版社的戏曲组负责人沈祖安参加。后来为了落实经费，把出版社的社长许天虹同志找来研究。③

姚水娟说：“领导那样关心，我很感激。一来我文化低，这方面也没经验；二来现在演出忙，开会也多，一时也抓不起来。不如和省里几位有代表性的演员一起出一本书。”她推荐了张茵、陈佩卿和吴剑芳。特别介绍了吴剑芳在基本功方面很有基础，是位优秀

的文武小生，要不是后来嗓音失调，名气还要大。她还建议：“先让每个人谈一出戏，比较容易完成。”

后来祖安送来一个经许天虹签字的计划，初定了书名《姚水娟等越剧名家谈表演》。但是有人提出，除姚水娟之外，其余的名气还不大，“名家”两字要拿掉。

但是姚水娟对我说：最好把“姚水娟等”四个字也拿掉，就用《越剧演员谈表演》作为书名。王子辉和沈祖安都赞成，书名就定了。还增加了屠笑飞，因为她的丑角也受欢迎，这也是姚水娟托沈祖安向王子辉建议的。

我在省文化局一次会议上表扬了姚水娟。我说：“姚水娟是一位旧艺人，但是有新思想。过去唱戏的因为环境影响，同行嫉妒，互相倾轧。现在姚水娟把为她出版一本介绍她舞台艺术的书变成大家来说，还推荐了四位，这种思想很好。”我还插过几句话，说：浙江的越剧不算古老，但是最大的剧种，队伍大。学习上海的经验，越剧也可以集中一批人才，成立实验剧团。上海是袁雪芬当团长，我们也可以让姚水娟当团长，应该配备支部书记和行政副团长。我当时也只是有感而发，并没有着手办，但是在1957年反右派的运动中，成了我的“罪状”，因为我“下令让反共女将姚水娟当团长，网罗地富反坏右，准备向党的文艺方针进攻”。

现在想来，我很对不起姚水娟。包括那本《越剧演员谈表演》薄薄的小册子，后来也批不出什么名堂，因为里面找不到一句反动的話，连落后消极的话也没有。事实上，姚水娟文化低，既谦虚，也胆小，开会发言都请别人起草的。

姚水娟虽然家庭成份和社会关系有点复杂，但是我们对她的过去很清楚，也很了解她，她是贫苦农民的家庭出身，解放后一直对党、对人民政府很有感情。真要让她当团长，其实是好事，决非坏事。麻烦的是，她的丈夫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较复杂，这和她也并非一回事。不过在当时，确实也有点小麻烦。运动一来，麻烦就大了。

第二本书是介绍笛子专家赵松庭的笛子吹奏法和他的作品介绍。书名是我取的，叫《赵松庭和他的笛子》，我写了序。后来赵松庭也当了右派，罪名是他要“用一根笛子来指挥浙江省委”。我没听说过，也不相信。我也没有，也根本不可能通过这本介绍笛子艺术的书来“鼓

动他向党进攻”。因此对我的批判我不在乎，但是也觉得对不起赵松庭，要没有这本书，他至少会少受些批判。现在可以冷静地来看过去的问题了。当年那种大批判确实存在是非颠倒、敌友不分的毛病，是一种左的极端化的思潮的影响，这是主要的。但是，也不能无视我们

文化界从古到今存在的同行嫉妒、互相排挤的坏作风。文人相倾，唱戏的艺人之间的争名夺利，和不唱戏的文人之间，都会有同行相嫉的事。等到一个运动开始，首先为了保护自己，为推卸责任，也难免有公报私仇。所以问题就复杂，被批判的人就更麻烦了。所以反右开始

不久，姚水娟首当其冲，我还找她谈话，要她正确对待。其实我也有些了解，有的人在大鸣大放中的态度和反戈一击中的揭发检举，完全变了一个人，实际上是金蝉脱壳的小滑头，也算不上大阴谋。有的向我写信揭发别人，不久我被打倒了，又对我揭发批判的，还是这个“

老朋友”。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，我只好笑着对他说：“你也真不容易，也是‘老前辈’了！”

第三本书是出版昆曲《十五贯》和确定剧本整理改编小组的名单。

当时参加研究的五个人：我和省文化局两位副局长陈守川和王顾明，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郑伯永、副处长林辰夫和浙江昆剧团团长周传璜，确定了名单。沈祖安是后来才来的，他拿去印在书里，所以他也了解一点“内幕情况”。真正了解情况的是郑伯永和林辰夫。④

关于陈静改名陈思和写进整理小组上的名单，实有多种实际情况，我不必多说了。陈静对我恐有误解，我对他的答复也许有不妥当的措词，当然也是通过宣传部文艺处的干部告知他的。这中间有没有传错，今天已不必多说了。所谓“内部情况”，说穿了是根据当时的政策原则的前提下，如何尊重和保护执笔者陈静。

至于后来署名之争，以及我究竟在《十五贯》这本戏的整理中出过什么力，起过什么作用，现在已有公允的结果，我也不必细说。

实事求是地说，我决非仅作为一位领导“参加一、二次会议”而已。现在老同志都不在了。沈祖安同志基本了解此事，我有没有伸手摘桃子？当时的具体政策是上一级党委执行的，可能有片面，这也是当时的历史条件。^⑤

但是我和祖安同志的交往，确是从他着手编辑这三本书开始的。我们来往并不密切，是细水长流。

我和祖安同志的友谊，是在我打入“另册”之后开始的。1958年的夏天，我在绍兴东湖公社劳动。他随当时主持工作的省文化局的副局长李碧岩同志经宁波、舟山来到绍兴。在公社附近的小饭店请我吃面，还喝了几两酒。我没有酒量，也没有心情喝酒，只有李碧岩一个人喝了半斤黄酒。但是那天我好像喝醉了酒。

因为李碧岩说：“不管怎么样，你黄源总是黄源，你过去付出的不会白费，今后还可以在文学上做贡献！虽人在基层，也可以在文化上出点力。”我明白，这种空话，不像李碧岩的本意，他也只能这样说。

我说：“现在我参加基层的三级干部会，也不敢发言。小队、大队到乡的干部也会把我当靶子打。”

李碧岩和沈祖安面面相觑。他们都一时觉得语塞，后来李说：“这也是他们的无奈。但是在会场外面我相信他们还是会体谅照顾的。劳动人民最大的优点，就是实在，不会口是心非。”

接着两位先后劝我：“时间长了，贫下中农会了解你的。知道你文化背景的农村干部，也会体谅你的。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你只有坚持和他们靠拢，这也是唯一保护自己的办法。”李碧岩知道说漏了嘴，最后几句话有点官腔了，他也只能这样说：“克服困难，认真改造。”

他们的话，使我吃惊，也使我温暖。实际上，我当时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以人民勤务员的立场在农村生活。不管人家怎么看，我明白：既然接受这个不可改变的长期改造的任务，也可以把他当作蹲点和体验生活来锻炼自己，除此之外，也没有别的出路。我们离开小面馆，三个人一言不发，心情都沉重。文化人在那样的环境下，心情都一样。

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963年，我和祖安往来不少，也去过他在水漾桥那条长巷里那幢破败不堪的小楼上，和他讨论戏曲的前景，也谈京剧和昆曲。但是好景不长，1964年后，文化界的空气又紧张起来。

三年后，文革开始了，我们在不同的批斗会上和劳动场地上见过几面。我们见面没有说话的机会，有时相互点点头。直到1975年以后，我去他那座小楼上。他说：“黄源同志，我们到城隍山上去坐坐吧！”我知道他胆小，家里有个有历史问题的父亲，又来了个大右派，不好办。

我们没有去坐茶馆，我也胆不大，就在吴山上茗香楼附近的大樟树下坐着，听周围的人们交换生活中各种令人兴奋和使人沮丧的信息，真是丰富多彩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很少说话，也不与人兜搭，也很少有人认识我们。在下山回家的路上，他问我：“作何感想？”我慨然答道：“很高兴，看来公道在人心。人心不散，国家还是大有希望。”

他认真地对我说：“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心情要宽松，身体要健康，您是长寿的，一定要为长寿创造条件。”

我很感激他这番话，但是我建议他：“现在你靠边站着，接受考验，可以写点回忆的东西，通过写人物来分析艺术，是你的强项。”他后来终究写了许多既写人又写艺术的文章，有的是我熟知的，有些比较陌生，但都是我所服务的对象。我看了很兴奋。

有些并不出名，但是很值得写，又是很少有人能想到去写的，结果他写出来，大家觉得亲切，实在是该写的。不过，我不止一次地对祖安说：“能不能不用这种方式？光是用旌表的口气来写，总有捧场和颂扬的味道，不是顶天立地，就是崇高完美。能不能在你自己回忆往事中写到在你生活中的真人，人物就会更加鲜龙活跳吧？”

他要我先写个序，准备编纂成集。我只能随意写了一张毛笔题词，他还不满足。我又请人代为执笔整理此文，再请祖安订正。我老了，也许观念跟不上形势了。但是从前就有的一种责任感，我想是不会过时的。

——1999年8月于浙江医院10病区1

号

——2002年10月口述补充于病床上

（作者为中国当代文学耆宿，鲁迅先生的弟子和战友，2003年以98岁高龄逝世。生前为浙江省文联名誉主席、浙江省作协名誉主席）

注释

① 黄源同志先是用毛笔写了一篇短序，并作为扉页题词。后来

兴起，就请人记录了这篇文章。又过了一年，他想补充几句话，但已经不能起床了。他坚持继续用口述，话不多，但说话很费力。有些是巴一熔同志和黄明明同志转述的，包括文章最后加上去的几句话，题目也是后来加的。他曾经对我说过：有感想还可以发，直到发不出声音。只要尚有一口气，脑子里还会有感想。但是在他弥留前的一个月，神志清时，亦说不清话，只是用浓重的海盐土话问我：“啊？是伐？…”他其实什么也不会说了，只是着急地问我，似乎我应该回答他。在我的印象里，他对我提到的几件事，较之有些代笔的文章，要客观得多。

②这是王子辉同志和黄老在杭州饭店开会时写在一张过期的餐券上的。

③许天虹是黄源同志的同学和同乡，从嘉兴调到杭州创办东海文艺出版社。

④《十五贯》1957年出版本上是这样写的：“《十五贯》剧本整理小组，执笔：陈思。后来加上周传瑛、王传淞、龚祥甫等名字，没有放黄源的名字，黄源也从未公开谈过他也是整理小组的一员。

⑤在1979年后，黄源始说到：“其实，我也参加过整理小组的讨论，我作为领导，例应不具名。郑伯永的名字，是周传瑛他们提出的，我也同意。但是郑伯永不愿意，认为这是他作为领导这个小组，并非合作者。我也赞成他的意见。”

作者简介

沈祖安，男，编剧、戏曲作家、戏剧理论家。浙江省诸暨市人，1929年出生于上海。解放前曾肄业于国立西湖艺术专科学校，攻西洋绘画。1949年6月入伍。后在浙江干校文工团、浙江省文工团编导组工作。1951年底调入浙江省文联创作组。后曾担任浙江越剧团和浙江昆剧团编剧及浙江绍剧团特约编剧，参加创办《戏文》杂志并担任副主编、编审，一直从事艺术评论和戏剧、曲艺的创作。60年来发表和出版有关戏曲和艺术的研究文稿达300余万字。主要著作有《纵横谈艺录》、《琵琶街杂记》、《弹词类考》、《编剧六题》、《变与不变——沈祖安艺术论集》、《沈祖安艺术美学论集》、《大江东去——沈祖安人物论集》、《琵琶蛇传奇——沈祖安传奇小说集》、《唱新话异——沈祖安曲艺论集》和《杭州旧梦录》等。为盖叫天、刘海粟和王传淞整理出版艺术论集《燕南寄庐杂谈》、《存天阁谈艺录》和《丑中美》等多种。创作和整理、改编各类剧本曲艺60余种。先后担任浙江省文化厅艺术委员会委员，杭州市文化局艺术顾问，浙江京昆艺术剧院艺术顾

问，浙江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、首席顾问，浙江省戏剧家协会顾问兼理论工作委员会主任，浙江省越剧艺术委员会名誉会长，浙江省政协京昆联谊会会长，浙江省政协诗书画之友社顾问，中国戏曲王国维国际学术论文大赛评委会主任，中国戏曲表演学会顾问。

厦门大学图书馆